

謹以此書
獻給吾妻

杜樂思博士 (Dr. Dolores M. Hsü)

目錄

(上冊)

地圖目錄	xiii
出版者言	xv
原著者中文版序	xvii
郭序	xix
第六版序(英文版)	xxi
第一版序(英文版)	xxiii
歷代紀元表	xxv
貨幣及度量衡折算表	xxvii
第一章 「近代中國」的概念	1
「近代中國」始於何時？	2
「近代中國」形成的動力	5
新的綜合思考	11
第一編 傳統制度的延續，1600-1800年	
第二章 清帝國的興盛	17
清朝的建立	17
努爾哈赤的崛起；滿洲和清的含義；佔領北京	
南明抗清運動	24
王朝的鞏固與輝煌	25
順治朝，1644-1661年；康熙朝，1662-1722年	
雍正朝，1723-1735年；乾隆朝，1736-1795年	
第三章 政治和經濟體制	41
政治結構	41

皇帝和貴族；中央政府機構；地方行政；農村基層控制	
經濟制度	53
土地和稅收制度；國家收支；人口	
第四章 社會和思想狀況	63
中國社會	63
家庭；宗族；社會分層；士紳；科舉	
思想潮流	73
清初對明朝心學的反擊；清代中期的考證學	
第五章 對外關係	85
西歐人的來臨	85
探險家和商人；傳教活動；耶穌會影響的衰落；	
西方科學技術的引進；中國喪失了現代化的機會	
俄羅斯的推進	100
穿越西伯利亞；早期派往中國的外交使團；	
《尼布楚條約》，1689年；圖理琛出使留居俄國的	
土爾扈特部，1714年；《恰克圖條約》，1727年；	
托時和德新的使俄，1729-1732年；	
俄國在中國的特殊地位	
第六章 國運逆轉：由盛到衰	123
滿清力量的衰落	123
行政無能；腐敗普遍；滿人和旗人墮落；	
財政窘迫；人口壓力；士人失責	
會黨起義	127
西方的推進與封貢體系	129
第二編 外患內亂，1800-1864年	
第七章 廣州貿易體系	137

單口貿易的緣起	137
廣州貿易	139
行商；交易程序；徵稅與交費；交易項目	
外國人在廣州的生活	148
行為規則；司法權問題	
英國改變廣州體系的企圖	151
馬戛爾尼使團，1793年；阿美士德使團，1816年	
第八章 鴉片戰爭	165
鴉片貿易	165
1834年的律勞卑使命	170
風暴前夕的平靜	173
林則徐在廣州	176
鴉片戰爭	181
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	
第九章 第二次條約安排	193
耆英的新外交	193
與璞鼎查的交情；1844年奏摺；「廣州入城問題」	
廣州方面的強硬政策，1848–1856年	198
亞羅戰爭	201
天津談判；1858年《天津條約》；上海稅則商議	
第二次協定	207
大沽的擊退；北京協定；俄國的推進	
第十章 太平天國革命、捻軍叛亂及回民叛亂	223
社會動盪的根源	223
社會經濟因素；鴉片戰爭的影響；政治腐敗；	
武備鬆弛；自然災害；客家人和基督教	
太平天國革命的爆發	227

太平天國的制度	234
土地制度；軍政合一；文化和宗教的合一；新曆法；	
社會政策	
外國的中立立場	237
曾國藩和湘軍	239
天國內訌	242
戰爭的轉捩點	243
太平天國的崩潰	246
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	248
戰略錯誤；意識形態衝突；領導集團的失誤；	
太平天國生活的自相矛盾；蹩腳的外交	
太平天國革命的遺產	250
捻軍叛亂和回民叛亂	252

第三編 外國帝國主義加劇時期的自強運動， 1861—1895年

第十一章 清朝中興與自強運動	261
新領導人及辛酉政變	262
合作政策和外交現代化	265
總理衙門；通商大臣；同文館；海關；國際法的引進	
軍事現代化和早期工業化	274
先驅者；恭親王與李泰國——阿思本艦隊；	
各省自強運動的開始；守舊派的反對	
自強運動的各個階段	280
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	
自強運動的局限與影響	285
缺乏協調；眼界狹窄；資本匱乏；外國帝國主義；	

技術落後和士風日下；社會和心理惰性

第十二章 對外關係與宮廷政治，1861–1880年 303

對外事務 303

斌椿使團，1866年；蒲安臣使團與修約，1868–1870年；

天津教案，1870年；覬見問題，1873年；

馬嘉理案，1875年

慈禧太后及其政治 313

懲戒恭親王；控制王位繼承

第十三章 外國侵佔臺灣、新疆與安南 321

日本侵略臺灣，1871–1874年 322

俄國侵佔伊犁，1871–1881年 325

清代在新疆的統治與回民叛亂；海防與塞防之爭；

崇厚出使和《里瓦幾亞條約》，1879年；

曾侯和《聖彼得堡條約》，1881年

爭奪安南的中法戰爭，1884–1885年 332

法國的入侵；清流黨的興起；戰爭爆發；和平解決

第十四章 帝國主義加緊擴張：日本侵略朝鮮與

「中國的瓜分危機」 339

朝鮮的開放 339

國內暴亂與國際政治 342

1882年兵變；1884年暴動；東學黨叛亂，1894年

戰爭爆發 346

和平協定 347

清朝失敗的原因 349

戰爭的反響 350

帝國主義加緊擴張；民族工業受到壓制；日本的崛起；

中國的新政治運動

戰後對外關係 351

三國干涉；中俄秘約；割地狂潮；門戶開放政策

第四編 改革與革命，1898-1912年

第十五章 1898年的維新運動 361

早期維新派和傳教士的影響 361

保守的改革者：翁同龢和張之洞 364

激進的改革者：康有為和梁啟超 366

今文經學運動；康有為努力爭取認同；康有為的崛起

百日維新 376

皇太后與政變 379

變法失敗的原因和影響 383

維新派缺乏經驗；慈禧的權勢；保守派的反對

第十六章 義和團事件，1900年 389

義和團事件的背景 389

對基督教的憎惡；民眾對帝國主義的怒火；

外國經濟支配下的艱難生計；自然災害

拳民的緣起 392

朝廷庇護拳民 393

東南互保 397

媾和 399

俄國佔領滿洲 402

義和團事件的影響 404

第十七章 清末新政和立憲派 409

清末新政，1901-1905年 409

立憲運動，1905-1911年 413

第十八章 晚清的思想、社會和經濟變化，重點討論	
1895-1911年	425
思想的再定位	425
傳統思想的變質；新學；日文譯著	
社會的變化	432
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的瓦解；新興階層；城市的成長	
經濟困境	435
預算赤字；貿易失衡；外國投資及其控制作用；	
帝國主義的兩面性	
第十九章 歷史透視下的清王朝	447
軟弱的領導與不完善的體制；滿人對漢人的猜疑；	
對西方挑戰本質的無知；內憂外患與資本不足	
外國的作用	
第二十章 革命、共和與軍閥割據	459
革命的背景與特徵	459
清朝的衰敗；人民起義的傳統；外國的影響；	
政治變革的必要；畢三次革命之功於一役	
孫中山與革命	461
檀香山與香港的影響；興中會，1895年；倫敦蒙難；	
艱難時期，1896-1900年；同盟會成立，1905年	
共和國的興起	470
鐵路國有化；武昌起義；清帝退位；歷史意義	
袁世凱背叛共和	479
二次革命；袁的帝制之夢	
軍閥割據時期，1916-1927年	485
清帝復辟，1917年；軍閥混戰	

第五編 主義與抗戰，1917-1945年

第二十一章 思想革命，1917-1923年	495
背景	496
新文化運動的展開	499
陳獨秀與《新青年》；蔡元培和北大；胡適及其貢獻	
五四運動，1919年	503
新文化運動的擴展	506
外來訪客；問題和「主義」；到東方去！到西方去！	
結論	511
圖片來源	519
索引	521

地圖目錄

1. 廣州河口：香港與澳門	139
2. 十九世紀初的廣州商館	142
3. 馬戛爾尼使團的路線，1793年	155
4. 鴉片貿易	167
5. 1859–1860年間通向北京的道路	208
6. 早期條約口岸，1842–1874年	212
7. 太平軍行軍路線及太平天國地區	233
8. 1775年和1911年時的清帝國疆域	450–451

出版者言

中國近代史為一門基礎的大學課程，而在港臺兩地以中文為主要媒介的社會裏，中國近代史以中文講授，課本以中文書寫而成，理所至明。可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因為中國政治動盪，以中文撰寫一冊公正不阿的近代史著述，實在困難。恰巧五十年代以來，受過正規的歷史學訓練、通曉多國語言的華裔學者的作品陸續湧現，但因專業需要及市場考慮，其中大多以英語成書，《中國近代史》就是這樣一本作品。其實，近年來不少這類作品在大陸及臺灣相繼出版漢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學術為天下之公器，若能摒棄文字之異、畛域之見，將來近代史研究的學術成果可以預見。

本書的長處詳見書後，在此不再贅述。本書按年份分上下兩冊編排，上冊從1600年起以迄1923年，下冊則始自1911年而終於1998年。中國近、現代史分期在史學界有不同的看法，以上的分冊方法一方面可以避開爭議，而另一方面在教學課程的安排上又比較有彈性。

原書序言、第一至十一章及第二十二至三十九章由計秋楓博士譯，第十二至二十一章由朱慶葆博士譯，第四十至四十二章由鄭會欣博士譯，全書由茅家琦和錢乘旦兩位教授審校。原稿最後上呈徐中約教授過目。本書稿翻譯過程當中，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梁元生、劉義章及張學明三位教授，提了不少寶貴的意見，而當時任文學院院長的郭少棠教授更執筆寫序推介本書。對於以上各人的幫忙，本社深表謝意。

翻譯及編輯超過一千頁的專著，實非易事，除語言習尚之外，人名、地方、機構名稱的互譯，重新檢索引文以還本來面目等等，不一而足，掛一漏萬在所難免，若能發現，煩請轉告，以祈再版時更正，幸甚。

中文大學出版社 編輯部

2002年3月

郭序

十九、二十世紀見證了中華民族史無前例的巨變。歷史大流，變幻莫測，驚濤拍岸，叫人寒心。中華民族猛然醒覺，憤而尋找重生的道途。

文明起落，文化興廢，民族強弱，自有原由。文明的接觸，文化的衝突，以至民族角力的成敗得失，更視乎他們的精神和生命力。過去二百年西方文化影響整個世界，替世界歷史定位。這個階段的歷史演變的詮釋，多少操控在西方領域之內。所謂漢學研究的源起，實際也脫離不了西力東漸的大潮流。

能擺脫西方漢學的陰影，以英文作為媒介，向西方世界描述近四百年中華民族的掙扎歷程，以近代之崛起為主線，帶出一段跨越文化偏見的歷史，徐中約教授在1970年首版的*The Rise of Modern China*，成為一本極具深遠影響的經典力作。在英語世界出現這本兼具中西史學和社會科學的精神，全面運用多種文獻資料，和吸收不同語文研究成果，以跨學科的方法撰寫的近代中國歷史，使當時流行英語世界的其他漢學史著不得不重新反思他們研究背後的文化觀點。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初版在1970年問世，次年獲得美國加州之「共和獎」(Commonwealth Prize)。此後每五、六年有一新版，2000年第六版完成。自1976年起，此書的國際版開始廣泛地在東南亞洲流行，成為一本研究近代中國必讀的史書。1978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紀念五百週年(1478-1978)發表之文告，列舉數十名著，徐著為其中之一。

1998年徐教授應香港中文大學之邀，擔任「偉倫訪問教授」，期間開始構思把這本英文巨著譯成中文，使華文世界讀者親炙書中的見解。筆者七十年代中葉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已開始拜讀徐教授的學術著作，包括翻譯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哈佛，1959)、《中國進入國際社會的外交1858-1888年》(哈佛，1960)、《伊犁危機：1871-1881年的中俄外交研究》(牛津，1965)，徐教授任教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

校，在1971年，由幾百位教授組成的學術評議會遴選徐教授任「研究講座」(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此乃該校最高的學術榮譽。筆者在柏克萊分校早已仰慕徐教授的學術成就，深知華人學者在美國學術界突出不易，而徐教授獲此殊榮，實是華人人文學者在史學界突圍而出的盛舉。

今年，徐教授訪問本校期間商議出版的*The Rise of Modern China*中譯本成功面世，華語世界終於可以拜讀這本影響歐美史學界多年的開山之作，可算是新紀元華文史學界一件盛事。

郭少棠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兼文學院院長

2001年2月



出版者言

中國近代史為一門基礎的大學課程，而在港臺兩地以中文為主要媒介的社會裏，中國近代史以中文講授，課本以中文書寫而成，理所至明。可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因為中國政治動盪，以中文撰寫一冊公正不阿的近代史著述，實在困難。恰巧五十年代以來，受過正規的歷史學訓練、通曉多國語言的華裔學者的作品陸續湧現，但因專業需要及市場考慮，其中大多以英語成書，《中國近代史》就是這樣一本作品。其實，近年來不少這類作品在大陸及臺灣相繼出版漢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學術為天下之公器，若能摒棄文字之異、畛域之見，將來近代史研究的學術成果可以預見。

本書的長處詳見書後，在此不再贅述。本書按年份分上下兩冊編排，上冊從1600年起以迄1923年，下冊則始自1911年而終於1998年。中國近、現代史分期在史學界有不同的看法，以上的分冊方法一方面可以避開爭議，而另一方面在教學課程的安排上又比較有彈性。

原書序言、第一至十一章及第二十二至三十九章由計秋楓博士譯，第十二至二十一章由朱慶葆博士譯，第四十至四十二章由鄭會欣博士譯，全書由茅家琦和錢乘旦兩位教授審校。原稿最後上呈徐中約教授過目。本書稿翻譯過程當中，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梁元生、劉義章及張學明三位教授，提了不少寶貴的意見，而當時任文學院院長的郭少棠教授更執筆寫序推介本書。對於以上各人的幫忙，本社深表謝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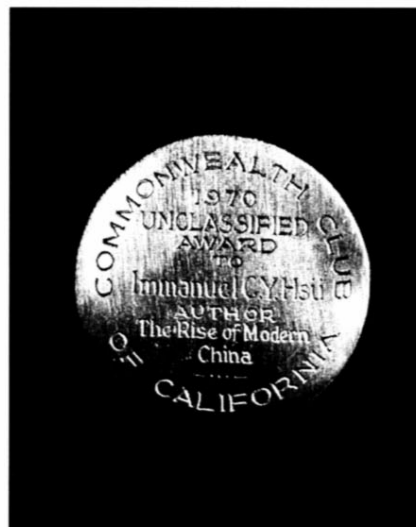
翻譯及編輯超過一千頁的專著，實非易事，除語言習尚之外，人名、地方、機構名稱的互譯，重新檢索引文以還本來面目等等，不一而足，掛一漏萬在所難免，若能發現，煩請轉告，以祈再版時更正，幸甚。

中文大學出版社 編輯部

2002年3月



正 面



背 面

徐中約教授所著的《中國近代史》(英文版)於1970年問世，次年獲得美國加州頒發的「共和獎」(Commonwealth Prize)，以表揚徐教授的學術成就。

原著者中文版序

縱觀四百年來中國近代史，其最大特徵即為中西文化之衝擊、適應、及和平共存。在此過程中，一個古老儒家帝國經無比艱難，蛻變為一個近代中國。

回溯明清之際，西風東漸，引起中西文化正面衝突的開端。西方文明，歷經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及工業革命，氣焰萬丈，其文哲、科技、經濟、軍備、地理知識、及造船技術，皆有空前的發展。西歐諸國以雷霆萬鈞之勢東來，強行打破了閉關自守的滿清帝國的大門。中華民族面臨史無前例的衝擊和生存危機，有識之士，確認自強更生之道，繼而投身民族振興的大業，並進入國際社會中奮鬥，爭取獨立與保持國家尊嚴。經百餘年之努力，今日中國已成世界大國之一。

漢唐元清盛世，國人向以為榮，但該時之天下，只是指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而已！二十一世紀之中國，具有龐大潛力，足以推進中國更上層樓，今日中國以科學和教育改革提升人民素質，並同時推動工業、科技、及資訊等三方面革命，到二十一世紀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此三大革命大致可望完成，屆時中國亦可成為一個世界超級大國。

近代史錯綜複雜，著者學淺，失誤之處必多，尚希讀者不吝指正。

徐中約
美國加州大學
2001年1月15日

第六版序

(英文版)

中國？那裏躺著一個酣睡的巨人。讓他睡著吧。
因為他若是醒來，將會改變世界。

——拿破崙

探尋一條在新的世界中體面地生存下去的道路，是推動近代中國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力。西方已經將這個新的世界強行推到了中國的面前。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內部的腐敗和外來帝國主義的羞辱性掠奪，如同一對孿生惡魔，給它帶來了長時期的衰落。中國為了克服這對孿生惡魔，推動社會進步，歷經1861–1895年間的自強運動、1898年的百日維新、1912年的共和革命、1919年的思想革命、1928–1948年間國民黨的建國運動和1949年的共產黨革命等階段。每一階段都是艱難的拼搏，有成功，也有失敗，但它們加到一起，對中國重現青春活力做出了貢獻。中國的復興在今天是有目共睹的。在步入二十一世紀之際，中國猶如一隻在涅槃中翱翔而起的鳳凰，處在一種自乾隆朝（1735–1795年）末期以來最良好的國際地位。1998年6月17日，美國的三位前總統和二十四位前高級官員在一封致國會的信中稱：「中國注定要在二十一世紀中成為一個偉大的經濟和政治強國。」¹ 中國在新的世

¹ 三位前總統是布殊 (George Bush)、卡特 (Jimmy Carter) 和福特 (Gerald Ford)。另外還有：前國務卿貝克 (James A. Baker, III)、克里斯托佛 (Warren Christopher)、伊格爾伯格 (Lawrence S. Eagleburger)、黑格 (Alexander M. Haig, Jr.)、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羅傑斯 (William P. Rogers)、舒爾茨 (George P. Schultz)、萬斯 (Cyrus Vance)；前財政部長布盧門撒爾 (W. Michael Blumenthal)、布雷迪 (Nicholas F. Brady)、米勒 (B. William Miller)、列根 (Donald T. Regan) 及西蒙 (William E. Simon)；前國防部長布朗 (Harold Brown)、卡盧奇 (Frank C. Carlucci)、切尼 (Dick Cheney)、佩里 (William J. Perry)、理查森 (Elliott L. Richardson)、施萊辛格 (James

紀中如何行動，將對全世界產生關鍵性影響。正如美國與蘇聯的關係制約了此前的半個世紀一樣，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將制約未來的半個世紀。²

在古代，中華文明有輝煌燦爛的成就，而希臘—羅馬、猶太—基督教文明則在西方繁榮發展。這兩個文明各自處在光輝而孤立的狀態，相互間知之甚少。的確，東方和西方迥然不同，兩者沒有碰撞。今天，世界是一個地球村，一個國家裏發生的事情將立即影響到其他國家。從文化的意義上來說，中國可以被看作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者，而美國則是西方文明的現代化身。它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碰撞。通過影響、融合和適應，這種碰撞既可以使原有文化扭曲變形，也可以使原有文化得到充實提高。只要雙方和平共處、容忍差異、增進協調和諒解，就會出現一個史無前例的和平昌盛的新紀元。在太平洋兩岸都需要有睿智賢明的治國之道。

在準備本版的過程中，我得到了我的研究助理費爾茨 (Edward C. Fields) 的幫助，他在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我對他致以深深的謝意。

徐中約

加州，聖巴巴拉

Schlesinger)；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萊克 (Anthony Lake)、麥克法蘭 (Robert C. McFarlane)、鮑威爾 (Colin L. Powell)、斯考克羅夫特 (Brent Scowcroft)。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7, 1998。

² Richard Haass, "Fatal Distraction: Bill Clinton'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fall 1997, 120.

第一版序

(英文版)

這部通史主要表達本人以中國人的身分對近代中國發展進程的看法，同時也汲取了過去三十年裏西方和日本的豐碩學術成果。我們在此考察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動盪時代，當中，內外因素相互交織，將一個儒家普世帝國改造成一個現代民族國家。這一性質的轉變非常艱難、緩慢，有時還痛苦萬分；對這個過程作內在的考察，將有助於理解當今中國的行為舉措。

本書體現了本人長期研習西方歷史和中國歷史的心得。本人在哈佛大學研習歷史時得益於許多位教授的教誨，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謝，他們是：費正清、楊聯陞、賴世和 (Edwin O. Reischauer)、蘭格 (William L. Langer) 和葉理綏 (Serge Elisséeff) 諸公。本人要感謝哈佛燕京學社所提供的四年獎學金，使本人得以在令人鼓舞的環境中進行了研究生階段的學業。本人還要感謝無數位作者，他們的著作直接或間接地幫助本人撰寫本書。要在這裏一一枚舉他們是不可能的，但本人想提幾個對本書幫助最大的學者和研究中心。蕭一山的巨著《清代通史》在1927-1928年首版時是兩卷本，1963年擴展成了五卷本，該書真是一座資料寶庫，為本書提供了豐富的內容。費正清的著作是整整一代學者的靈感之源，而且，在他多聞博識的指導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出版了幾十種專著，大大地提高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術水平。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東京東洋文庫和中國大陸歷史學會出版的一系列著作，都在各個不同的方面有所助益。本人要特別感謝印地安那大學教授鄧嗣禹博士，他對本書文稿的真知灼見，令本人得以作了許多更正和改善。本人也要感謝過去十年裏的許多學生，他們的啟發性提問使本人不斷注意到他們的需要，並時常開拓了新的探討空間。還要感謝克拉德尼克夫人 (Alice Kladnik) 為本書手稿打字；李恩涵先生則為本書準備了索引。最後，本人要特別感謝內子杜樂思 (Dolores) 博士，要不是她不斷的鼓勵、精神上的支持和摯愛的陪伴，本書將不可能完成。

儘管本人得到了所有這些幫助和啟發，本書的任何錯誤都只應由本人一人來承擔。在將書稿付梓之際，本人企盼本書能推動其他學者做出更有價值的貢獻，誠如中國的一句老話：「拋磚引玉」。

徐中約
加州，聖巴巴拉
1970年元旦



歷代紀元表

清朝 (公元1644–1911年)

順治 (公元1644–1661年)

康熙 (公元1662–1722年)

雍正 (公元1723–1735年)

乾隆 (公元1736–1795年)

嘉慶 (公元1796–1820年)

道光 (公元1821–1850年)

咸豐 (公元1851–1861年)

同治 (公元1862–1874年)

光緒 (公元1875–1908年)

宣統 (公元1909–1911年)

中華民國 (公元1912–)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公元1949–)

貨幣及度量衡折算表

貨幣 (公元1600-1814年)

1兩 = 1中國安士或1.208英國安士純正白銀
= 1/3英磅 = 6先令8便士
= 1.63美元
= 1.57西班牙元
(1894年1兩跌至3先令2便士，1904年跌至2先令10便士)
1英磅 = 3兩 = 4西班牙元
1西班牙元 = 0.72兩或5先令

重 量

1石 = 100斤
= 133 $\frac{1}{3}$ 磅
= 60.453千克
1斤 = 16兩
= 1 $\frac{1}{3}$ 磅
= 604.53克
1兩 = 1 $\frac{1}{3}$ 安士
= 37.783克
16.8擔 = 1長噸
16.54擔 = 1公噸

長 度

1里 = 1/3英里 = 1/2千米
1尺 = 1肘尺 = 14.1英寸
1畝 = 1/6英畝
15畝 = 1公頃

「近代中國」的概念

擁有近四千年文獻歷史的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近代以前，中華文明基本上是土生土長地自行發展的，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國人的獨立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中國孤立於其他一些重大的文明之外。然而，隨著地理大發現時代的來臨，一種截然不同的情形出現了。在公元十六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險家和使節開始經新航路抵達中國的華南地區，商人和傳教士也接踵而至。此後不久，俄羅斯人*也在十七世紀中葉跨越西伯利亞到達滿洲邊境。這些事件對中國來說不啻是劃時代性的，因為它們打開了中國悠久的孤立局面，開啟了東西方之間的直接接觸。這種交往雖然在一開始時並不顯著，而且步履維艱，但在十九世紀卻發展成為一股引發中國與西方之間直接碰撞的力量。此外，從中國內部發展的角度來看，歐洲人的來臨還有另外一層意義，因它與滿族的崛起和滿清異族王朝的建立發生在同一歷史時期。這些重大的內外形勢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隨後的歷史具有與以往時期迥然相異的特徵。

首先，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的會合結束了中國的閉關自守，使它越來越多地介入世界事務，乃至於到今天，在中國或西方發生的事情都會即時產生相互的影響。其次，外來因素與中國內部因素的相互作用，引起了中國在政治體制、經濟制度、社會結構和思想傾向諸方面

* 譯者據英文Russian一詞翻譯，後文相同。據歷史記載，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形成俄羅斯統一國家。1721年稱俄羅斯帝國。1917年十月革命後誕生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簡稱蘇俄。1922年底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由十五個加盟共和國組成，簡稱蘇聯。

的重大變化。因此，「變化」便成為這段時期的一個主要特徵，使這一時期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為複雜。第三，異己因素，即來自外部的西方人和來自內部的滿洲人強行介入漢族人的生活，激發起一種強烈的民族或種族意識 (nationalistic-racial consciousness)，這種意識深刻地影響中國未來的歷史進程。由於這段時期與以往各個時期的區別非常巨大，因此，人們完全有理由把它當作一個單獨的歷史時期加以考察。

「近代中國」始於何時？

儘管西方歷史與中國歷史的會合在十六世紀就已經開始，但其作用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顯現出來。其時西方的強烈活動引起了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因此，學者對於把十六世紀還是十九世紀看作是近代中國的開端這個問題上頗有分歧。一個很有影響的學派，其中主要包括西方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馬克思主義學者和許多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學者，把1839-1842年的鴉片戰爭看作近代中國的起點。這一學派的中國學者認為，這場戰爭標誌著外國帝國主義侵入中國的起點，此後的中國歷史便主要是一部帝國主義侵華的歷史。西方歷史學家認為，這場戰爭意味著外國在華活動的加劇，這些活動打破了中國的孤立局面，並在中國開創一個革命性變化的時代。而馬克思主義學者則認為，這場戰爭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之兇惡的縮影，它把「半封建」的中國拖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淵。

第二個學派，主要由一些較為傳統的中國史學家組成¹（他們的意見有些已開始為西方學者所認同）。他們對以鴉片戰爭是一個新時代開端此一觀點提出挑戰。他們認為：以明（1368-1643年）清（1644-1911年）兩代交替時期歐洲探險家和傳教士來華那段時期作為近代中國的起點會來得恰當，因為，就內部事態而言，該時期適逢滿族的興起和清王朝的建立；就外部局勢而言，這一時期西學開始傳入中國。他們爭

¹ 如蕭一山：《清代通史》，修訂本（臺北，1962年）；李守孔：《中國近代史》（臺北，1961年）；李方晨：《中國近代史》（臺北，1960年）。

辯說，儘管西方的影響在十九世紀發揮了極其巨大的作用，但這只不過是兩個半世紀前業已啟動的進程的延伸和強化而已，而且鴉片戰爭之後的百多年的時間，也難以體現一部四千年歷史的近代時期。此外，界定近代中國起自於1600年前後的做法，可以使近代中國的開端與近代歐洲的開端趨於一致。

上述這兩種觀點都有道理，但也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從影響方面來看，十九世紀西方的衝擊在促使傳統中國向近代中國轉型上所起的作用，肯定比十六、十七世紀歐洲探險家和傳教士到來所起的作用更為巨大。誠然，耶穌會士傳入了天文學、數學、地理學、製圖學和建築學等西方科學，但他們的影響只局限於中國統治集團內部的一小撮士大夫。他們幾乎沒有給中國的政治體制、社會結構和經濟制度帶來任何影響，在這些方面仍然是傳教士到來之前的那種模樣。從這個角度來說，前一個學派的理由似乎很充足。

但是，如果我們對前期的機構制度不甚了解的話，那麼我們將無法全面評判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所發生的各種變化。對西方衝擊的研究，必須首先對這種衝擊的承受者有所瞭解。而且，鑒於西方和俄羅斯在影響近代中國命運時，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我們就更不應忽視中國與它們的早期交往所具有的意義，也不應忽略它們所採取的推進方式——西方海權國家從南面向上推進，而陸上大國俄羅斯則從北面向下挺進，它們形成了一種鉗形勢態，目標直指中國的心臟北京。²確實，從歷史回顧的角度來看，十六、十七世紀歐洲人和俄羅斯人的來臨，為十九世紀西方的強烈活動鋪平了道路。基於這些理由，後一種學派似乎也有可信的論據。

然而，我認為這兩個學派可以通過折衷的方法得到調和。即使把鴉片戰爭界定為近代的起點，我們也仍需熟悉中國傳統的國家和社會

² Immanuel C. Y. Hsü, *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e Diplomatic Phase, 1858-1880*, 2nd printing (Cambridge, Mass., 1968), 108. 也見蔣廷黻：〈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清華學報》，第9卷第4期，第783-828頁（1934年10月）；T. F. Tsiang, "China and European Expansion," *Politics*, 2:5:1-18 (March 1936).

形態，因為這些形態制約了中國對十九世紀外來挑戰所作的反應。西方的入侵可以被視為一種催化劑，促使傳統中國轉化為近代中國。但是，如果對原先的機制缺乏相當瞭解的話，我們就很難理解這種轉化的效果。

因此，對1600年到1800年間內政與外交的發展進程作概括性的探討，將為我們正確地理解近代中國提供了必須的背景資料。在這段時期，中國的政治體制、社會結構、經濟制度和思想狀況，本質上仍然與過去二千年的情形頗為相同。其政體是一個由皇室統治的王朝；經濟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以士紳階層為核心；支配性的意識形態是儒家學說。瞭解了中國的這種傳統狀況，我們就能更容易地評判十九世紀中國在應付強烈的西方活動時所採取的行為舉措了。這種折衷的方法保持了後一學派的歷史完整性而又不損害前一學派的現實主義思維。

也許有人會問，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的會合為什麼到十六世紀才開始，而西方的影響又為什麼到十九世紀才得以加強？解答這些問題時，我們必須記住，在十九世紀之前的二千多年裏，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主流是朝著相互分離的方向發展的。西方文明起源於希臘，向西發展到羅馬，隨後又散佈到整個西歐並傳入美洲；而中華文明則孕育於黃河流域，向南擴展到長江流域，隨後並傳播到中國的其他地區。因此，這兩個文明的主流不是彼此接近，而是越來越遠。只有當其中的一個文明獲得了足夠的力量和技術、並為著自身的利益擴張到另一個文明地區時，這兩個文明才得以會合。

固然，在地理大發現時代以前，兩個文明之間曾有過一些時斷時續的交往。漢朝(公元前202年—公元後220年)與其同時代歐洲的羅馬帝國都已相互有所聞。中國人尊稱羅馬帝國為「大秦」。公元73年到102年間，活躍於中亞地區的中國名將班超甚至派遣了一位使節³去尋找羅馬帝國，此人到達了波斯灣。其他一些交往包括：中國的絲綢輸入了羅馬，而在公元120年和公元166年羅馬的雜耍藝人和商人則到達了

³ 甘英。

中國。在唐代(618–907年)，景教和伊斯蘭教傳入了中國；而且，在唐、宋(960–1279年)時期，阿拉伯人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也十分活躍。在元代(1280–1367年)，威尼斯商人馬菲奧·波羅(Maffio Polo)和尼科羅·波羅(Niccolo Polo)以及後者著名的兒子馬可·波羅(Marco Polo)，還有許多方濟各會(Franciscan)傳教士，都曾到過中國。在明代(1368–1643年)，由鄭和率領的遠洋航海壯舉，到達非洲東岸；中國的活字印刷術也在十五世紀中傳到了歐洲。可見在地理大發現時代以前的許多世紀中，中國和西方之間已存在了一些零星的交往。但這兩個文明的直接碰撞，還有待於其中的一個能夠作出到達彼方的持續推進。

到地理大發現時代，歐洲已充分具備了前往東方的地理知識和造船技術。葡萄牙人的航海遠征，把一些探險家和殖民帝國的創建者帶到了亞洲，商人和傳教士也尾隨而至，帶來了西方世界的科學知識。東西方之間一種超出偶爾接觸的經常性交往開始了，但這種交往仍然沒有盛行到足以使這兩個文明面對面地接觸。歐洲還得等到工業革命以後才獲得足夠的力量作有力而持續地到達中國的努力。英國作為工業革命的搖籃在這場推進中遙遙領先，這並非偶然。很明顯，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的交會不可能發生在地理大發現時代之前，而這兩個文明的直接碰撞也不可能發生在工業革命以前。

「近代中國」形成的動力

理解任何歷史時期的關鍵，在於找出決定該時期形態的主要動力。在近代中國，我們看到了幾種發揮作用的強大動力，其中有些是明顯的，有些則是潛藏的。首先，自然是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家命運的興衰。在清代，朝廷最為關注的，是如何維持其自身的權力。為了贏得漢人的善意和承認，清廷決意與中國傳統秩序打成一片，保留了明朝的政體和社會制度，採納理學為官方哲學，並吸納漢人加入官僚機構，以一種二元首長體制(dyarchy)的形式與滿人共事。另一方面，清廷大興文字獄，懲罰譏諷異族統治的人；設立宗人府，監督滿族顯貴的出身、受業和婚姻；禁止滿漢通婚，並嚴禁漢人遷居滿洲，通過這些措施，努力維護滿族的種族特

性。為適應某些特殊的需要，清廷也設立了一些新的政府部門，如在1638年建立理藩院來管轄有關西藏、蒙古和西域(新疆)的事務；1729年設立軍機處，使決策過程集中化；1861年更設立總理衙門來掌管與西方列強的外交關係。為鎮壓叛亂並擴展疆土，清廷向遙遠的邊疆發動了多次軍事征討，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疆域第二大的王朝。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有許多洋人受聘擔任政府官職，從而使滿—漢二元體制擴展為一種「滿—漢—夷」的混合體制(synarchy)。⁴所有這些以及其他許多政策措施，都旨在確保大清江山的長治久安，它們強烈地影響並引導1644–1911年間這個國家政治生活的主流。在滿清王朝覆滅後，民國政府最關注的是對內統一國家、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到了1949年以後的共產黨執政時期，我們則看到了一種企求實現社會主義改造、迅速實行工業化和爭取大國地位的強烈動力。當朝政府的這些重要政策，在引導國家和人民的命運方面，顯然發揮了主要的作用，因而應當受到歷史學家們的持續關注。

然而我們決不能忽視那些更難以把握的歷史潛流，它們也是一種決定中國形態的動力。確實，在清朝這樣一種不允許有任何合法反對派政治團體存在的專制制度中，秘密活動不時地對歷史的開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儘管有許多漢人加入了滿清政府或默認了清廷的統治，但有很多人卻仍然保持著沉默的抵制。清廷乃是一個異族王朝的鐵定事實，持續地激發了漢人以秘密會社活動、民族或種族起義，以及革命等方式進行反抗。最初，反清情緒伴隨著一種恢復前明王朝的渴望——如各南明小朝廷的抗清運動、鄭成功及兒子在臺灣的抵抗和三藩之亂都表明了這一點。當這些運動相繼失敗後，「反清復明」的思想暗暗地在諸如天地會和白蓮教等秘密會社中間得到流傳滋長，並伺機而動。當乾隆朝(1736–1795年)末期中央政府的警惕鬆懈之際，1796年便爆發了白蓮教起義，並持續到1804年，這決非偶然的巧合。

⁴ John K. Fairbank, "Synarchy under the Treaties," in John K. Fairban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 1957), 204–31; "The Early Treaty System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1968), 257–275.

在白蓮教起義平息後，民族或種族反抗再次歸於沉寂，一直到1850–1864年太平天國時期才又一次復興。不過太平軍只保存了上述口號中的「反清」部分，卻拋棄了恢復明朝的思想，因為他們要創建一個屬於自己的王國。1864年太平軍失敗後，民族或種族革命再度轉為秘密會社的活動，並激發了孫中山等一批後來革命家的鬥志。到孫中山一輩投身革命之時，革命抱負已大大擴展，包括了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復仇意識。隨著1912年滿清王朝的垮臺，原初的「反清」目標已達到了，於是民族主義革命轉向了反對外國帝國主義。歐洲殖民列強在二十世紀頭二十年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對象；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前半期的主要對象是日本，五十年代後期起則是俄國——應予注意的是，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同樣強烈地憎恨俄國。

由此看到，在整個近代中國三百多年的時期內，反對外來因素的民族或種族抗爭，構成了一個清晰的歷史主題，它時而浮現到表面，時而轉入地下。這種動力經久持續，一位著名的史學家帶點誇張地評價說，近代中國的歷史可被視為一部民族主義革命的歷史。⁵

第三種動力是在新的天地裏尋求一條求生之道，這個新天地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西方強加到中國頭上的。諷刺的是，西方文明在其他地方顯得極有創造力且生機勃勃，但在與中國的直接對抗時，卻表現出破壞性大於建設性。它加速了舊秩序的瓦解，卻沒有提供替代它的新秩序，這給中國人留下了在舊秩序廢墟上構建一個新秩序的艱巨任務。中國人背負著傳統的重負，對西方世界的本質又一無所知，他們在黑暗中摸索，探求一條適應時代巨變的生存之路。著名政治家李鴻章稱這種努力為「開三千餘年未有之變局」。⁶中國人面臨著一個令人焦躁的痛苦抉擇，那就是：為了使中國得以繼續存在，並在國際社會中贏得一席之地，舊中國的多少成分應予拋棄，近代西方的多少東西應予採納。

對一種新秩序的探求涉及一場極其艱難的觀念之爭，需要排除那

⁵ 蕭一山，前引書第1卷，第15頁。

⁶ 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上海，1921年），「奏稿」，第19卷第45頁。1872年6月20日的奏稿。

種過度的自尊意識和對外來事物的藐視之情，拋開那種認為富庶的中華上國毋需借鑒化外蠻夷、也毋需與彼等結交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不過，在1860年中國再度戰敗、英法聯軍佔領北京之後，一些較具前瞻的清廷大員⁷意識到西方的挑戰乃無可逃避之事實，中國如要生存就必須有所改變。他們引用著名學者魏源提出的那句口號：「師夷長技以制夷」，在六十年代初發起了一場所謂的「自強運動」。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設立了同文館，並按照西洋模式設置了一些由軍工產業支撐的軍械所和造船廠。這場持續了約三十五年的運動，是一種浮於表面的近代化嘗試；它只採納了西方文明中那些具有直接實用價值的東西，而另一些更為可取的方面——如政治體制、經濟制度、哲學、文學和藝術等——卻完全被忽略了。即使是這個時期中較進步的中國人也確信，除了堅船利器之外，中國從西方沒有多少東西可學。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敗績，證明了自強運動有不足之處。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官員意識到這場運動的局限性，認為必須擴大現代化的綱領，把政治改革也包括進去。自信的思想家康有為和他著名的弟子梁啟超，鼓動皇帝遵循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方式，實行維新變法。然而，即使在後期階段，維新分子也並不倡導完全西化，而只是鼓吹建立一種融中西諸因素於一體的混合政體。這場運動的精神是著名的學者型官僚張之洞所說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康有為改革方案的結果，是1898年的「百日」維新，但卻突然地以失敗而告終。

與此同時，孫中山發起了一系列秘密的革命活動。孫中山是一位接受西方教育的醫生，他認為靠一次不全面的改良來醫治中國的病痛是無濟於事的，只有通過一場徹底的革命才能解決問題。他接過了民族或種族革命的火炬，倡導推翻滿清統治。他在社會的邊緣區域開展活動，贏得了秘密會社、下層階級和海外華僑的支援，但卻沒有得到士大夫階層的擁護，他們普遍地追隨著康有為和梁啟超。在1900年那場令朝廷丟盡臉面的義和團事件之後，越來越多的士人也加入了孫中山的事業，孫的形象由原先的那種犯上作亂者一變而為愛國志士。辛

⁷ 如恭親王、文祥、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人。

亥革命成功之後的第二年，一個西方式的共和國建立了，在四千年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廢除了由帝王統治的王朝。

儘管中國告別了過時的政治體制，往昔的陰影卻繼續沉重地支配著社會習俗和思想生活。政府改頭換面了，但它的精神實質還與過去一樣；貪污腐敗、軍閥割據、恢復帝制的妄想和混亂失控的情況比比皆是。民國的創立並未帶來人們期望的和平與秩序，於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逐漸相信，如果不進行一場徹底的思想變革，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政府和進步的社會。那些在日本、歐洲或美國留學的人——如陳獨秀、蔡元培和胡適等——在二十世紀初期回國後，發起了一場「新文化運動」和一場思想革命，到1919年「五四運動」時形成了頂峰。這個時代的精神風尚是反對傳統主義和儒家思想，倡導完全西化、「科學」和「民主」。在這個意識形態沸沸揚揚的時期，湧現出了兩種佔主導地位的哲學。杜威的那套信奉以漸進手段進行社會改良的實用主義哲學，由他的弟子胡適介紹過來；而崇尚革命手段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則在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影響下，由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大力宣傳。

從十九世紀初對西方的輕蔑排斥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對西方的崇拜，中國走過了一段漫長的道路。一位學識淵博的政治學家用以下的話，總結了這個變化的順序：「首先是影響器物的技術；而後是關於國家和社會的原理；最後則是觸及精神生活核心的觀念。同治朝的自強運動、1898年的維新變法和1919年的五四運動各自標誌了這三個階段的思潮要點。」⁸有人將五四運動以後的歷史看作第四個階段——「現代」中國，但是一般都不把這個時期與「近代」中國割裂開來。

現代中國的主題是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爭奪國家最高權力的鬥爭。中國共產黨創建於1921年，正值圍繞五四運動展開的那場思想革命之際。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中共在1923年開始與國民黨合作。孫中山受布爾什維克革命勝利的強烈影響，期望蘇聯幫助他重組政黨和軍隊，也迫切要求與蘇聯和中共合作。然而，1925年他的逝世注定了國共聯盟的不幸結局，至1927年兩黨便發生了公開的分裂。隨著1928

⁸ Kung-chün Hsiao,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K'ang Yu-wei — An Attempt at a New Synthesis," *Monumenta Serica*, XXI (1962), 129–130.

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國民黨的軍事統帥蔣介石便崛起成為新的鐵腕人物。

國共分裂之後，毛澤東和朱德在江西建立了他們自己的蘇維埃政權，實際上獨立於秘密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蔣介石對朱毛部屬展開了五次圍剿，1934年後期將其逐出中國東南地區。中共軍隊進行了史詩般的二萬五千里⁹（實為6,000英里）長征，到達西北地區，在那裏再次站穩了腳跟。1937年日本發動侵略之際，中共問題尚未得到解決。面對一個共同的敵人，國共兩黨又組成了聯合陣線，但他們彼此並不信任。1945年抗日戰爭一結束，內戰便很快爆發了。國民黨被長期的對外戰爭拖得筋疲力盡，又受到通貨膨脹失控之威脅，且背著地主土地所有制這個古老難題和沉重包袱，還備受黨內派系傾軋的困擾，因此，儘管國民黨擁有明顯的軍事優勢並有美援作支撐，卻還是丟失了大陸，撤至臺灣。毛澤東在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上粗略的概述展現了近代中國發展進程中幾個重要的階段：從鴉片戰爭以前對西方的排斥到1861–1895年間的自強運動、到1898–1912年間的政治改造和革命、再到1917–1923年間的思想革命，最後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掌權。雖然歷史很少以單向線條的形式發展，但總的發展模式和一些重要的里程碑，卻是在構建概念框架時充當有用的路標。

與上述重大的政治變化同時進行的，是一種經濟和社會的根本轉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自強運動期間，近代工業和企業發展起來，而外國人則在「不平等條約」保護下在條約口岸開辦製造業、航運業、銀行業和貿易商號。這些不同類型的活動並行不悖的狀態，造就了一種混合經濟，含有一種半殖民主義的氣息，這種氣息是近一個世紀裏中國經濟的顯著特徵。

從社會方面來看，在1905年廢除科舉之後，千百年來一直支配著中國社會的士紳階層開始黯然失色。傳統社會結構的四個層次——士、農、工、商——也隨著兩類人的興起而瓦解了。這兩類人是買辦和軍閥，他們代表著新的財富和新的權力。此外，個人主義、自由和

⁹ 一里等於三分之一英里。

男女平等西方觀念的傳入，也侵蝕了儒家「三綱」和「五常」的家族忠孝觀念。¹⁰ 當個人起來堅持自己作為國家的成員而非作為家族的成員之地位時，宗族社會便瓦解了。社會變革的節奏在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大大加快了，而所有變革中最激烈的變化，也許是農民從一種惰性的實體轉化為一種積極型的國家成員。

近代中國展示了一幅如此光怪陸離的紛繁景象，以致我覺得：諸如外來帝國主義、西方影響或資本主義及封建剝削等局限性的理論，都無法對之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變化的動態表明，近代中國歷史的特徵並非是一種對西方的被動反應，而是一場中國人應付內外挑戰的主動奮鬥，力圖更新並改造國家，使之從一個落後的儒家普世帝國，轉變為一個在國際大家庭中擁有正當席位的近代民族國家。這種見解，避免了用「外因」來解釋中國歷史及其所暗含中國僅僅是「作回應」的思想陷阱。

新的綜合思考

我提議在開始研究近代中國時，應對1600–1800年間「傳統的」國家和社會作一考察，這一考察是探討上述幾個發展階段所必需的前提。這一方法明顯不同於以往人們已嘗試過的幾種途徑。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富開拓性的西方學者，偏重於就中國的對外關係作一般性著述，而且他們幾乎純粹依據西方資料，完全忽略或是輕描淡寫地對待中國的內部狀況。在他們之後的一代學者，則將著重點從通史性論著轉向了專題性研究，把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當作一個考察的主題。這段時期的著述，力圖從中國一方的角度來看待歷史，並在參考西方資料的同時，大量運用中文資料。他們開創了一種新的研究趨向，而且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近代中國的知識。最近，一些人又嘗試著探究獨立於西方影響的中國社會、經濟和思想之基本因素，或是從內部環境的角度來考查中國的變化，所有這些研究都獲得了較高的學術成就。

¹⁰ 「三綱」指約束君臣、父子、夫妻之間關係的規範。「五常」則還包括了另兩類規範，即有關兄弟之間與朋友之間的關係。

大陸的中共史學家也一直以巨大的熱情從事近代中國的研究，這顯然是響應毛澤東關於對中國近代歷史給予特別重視的號召。他們從辯證唯物主義、階級鬥爭和社會性質轉變的立場來進行研究。在近代中國的分期問題上，雖然還未達成任何完全一致的意見，但在大多數大陸學者中間似乎已取得了某些暫時的共識：(1) 外國資本主義入侵和農民起義時期，1840–1864年；(2) 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主義形成時期，1864–1895年；(3) 民族危機加深和愛國主義運動興起時期，1895–1905年；(4) 資產階級革命興起和失敗時期，1905–1919年。中國近代史的這四個時期據稱構成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與之相對的是從1919年到1949年之間的中國現代史時期，它構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¹¹

中國、西方和日本的學術界對近代中國的研究不斷深化，而馬克思主義學者也在這領域迎頭趕上，這種情形使人感到，近代中國研究這個相當年輕的領域正日趨成熟。在過去的三十年裏，通過運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各種新方法，以及參閱多方檔案資料和跨學科研究等手段，幾個主要語種中都湧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富有真知灼見的專題研究著作。豐富的研究成果和學術水平的普遍提高，推動著一幅全方位歷史畫面的呈現，這幅畫面將兼收並蓄地吸收中國人、日本人、西方人學術成就的精華，也包括有用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成就。編寫中國近代史應做到既反映中國學界的見解，也反映外國學者能夠從外部進行觀察而得出的那種客觀性——鑒於中國與西方交往的密切，這種做法即使並非絕對必要，也至少是大合時宜的。這樣的綜合可望對近代中國獲得一種準確的歷史透視。

參考書目

坂野正高：《近代中國外交史研究》（東京，1970年）。

《歷史研究》編輯部編：《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討論集》（北京，1957年）。

¹¹ 《歷史研究》編輯部編，〈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討論集〉（北京，1957年）。

- Cohen, Paul A.,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1984).
- Dawson, Raymond, *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London, 1967).
- 衛藤藩吉：《東アジア政治史研究》（東京，1968年）。
- Fairbank, John 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 1965).
- 范文瀾：《中國近代史》，第1卷（北京，1949年）。
- Feuerwerker, Albert, Rhoads Murphey, and Mary C. Wright (eds.),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1967), Intro. 1–14.
- Ho, Ping-ti, and Tang Tsou (eds.), *China in Crisis*, Vol. I, *China's Heritage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 Vol. II, *China's Policies in Asia and America's Alternatives* (Chicago, 1968).
- 蕭一山：《清代通史》，修訂本（臺北，1962年）。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全2卷（臺北，1963年）。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1卷，1912–1925年（臺北，1979年）。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1979年）。
- Levathes, Louise, *When China Rules the Seas: 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1433* (New York, 1994).
- 李方晨：《中國近代史》（臺北，1960年），簡介。
- McAleavy, Henry,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New York, 1967).
- Morse, H. B.,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 (London, 1910–1918), 3 vols.
- Nathan, Andrew J. (ed.), *Modern China, 1840–1972: An Introduction to Sources and Research Aids* (Ann Arbor, 1973).
- Teng, S. Y.,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1954).
- Tsiang, T. F., “China and European Expansion,” *Politica*, 2:5:1–18 (March 1935).
- 蔣廷黻：〈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清華學報》，第9卷第4期，第783–828頁（1934年10月）。
-